

为今本《竹书纪年》乃后人据古本《竹书纪年》的残本辑补之作,可以分析使用。持这两种观点的学者尽管意识到今本《竹书纪年》存在严重的问题,却采取过于宽容的态度,只对行为描述,而缺乏对性质的准确判定,从而影响他们论说的可信性与准确性。

一些学者以为古本《竹书纪年》属于辑佚本、今本《竹书纪年》属于重编本,强调今本《竹书纪年》的价值;一些学者以为古本《竹书纪年》、今本《竹书纪年》属于不同的整理本,都有价值。这两种观点在唐宋元时期的文献中找不到直接的证据,而是学者的间接推测,可靠程度小。

百年间学者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囿于资料与视野,对于《竹书纪年》的研究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对于数据及史实辨识不足;学者研究《竹书纪年》多集中在《竹书纪年》本身以及将《竹书纪年》条文分离地和其他文献比较,而缺乏在翔实数据下的系统研究。因此,全面系统地研究《竹书纪年》仍会有新的发现。

##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秦汉边郡研究

杜晓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在秦汉地方行政结构中,内郡与边郡在行政职能、吏员设置、民族构成、法律制度上存在着诸多差别。研究秦汉边郡,对于探索秦汉时期边地制度与内地制度相互影响融合的规律、秦汉边疆治理、民族关系、秦汉国家结构发展变化、地方行政机制的运作规律等有重要的意义。本世纪初,西北简帛的发现,极大推动了边郡研究。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外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分别从秦汉中央政府分层次、差别化治理、边郡防御系统、边郡职官设置、屯戍、文书运行等不同方面探讨了秦汉边郡的情况。笔者根据搜集到的相关论著,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关秦汉边郡研究做一简要综述,以期对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所裨益,疏漏之处,祈望方家指正。

### 一、关于边郡的综合性研究

关于边郡的综合性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关于边郡的综合性研究,国内学者大都从边疆史地的角度入手。木芹把西汉政区划分为五个层次,以三辅、河东郡、弘农郡、河内郡、河南郡为第一层次,将五原、云中、定襄、上谷、渔阳与北海、济南等 71 郡及广阳、中山、真定等 16 诸侯国作为第二层次;以武威、酒泉、敦煌、牂牁、益州、玄菟、南海等郡作为边郡,作为第三层次,或三类政区;以属国都尉为第四层次,或四类政区;以西域都护府为第五层次,或五类政区;以匈奴单于地为第六层次(《两汉民族关系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 年版)。李大龙更进一

步对各层次的治理方式及在国家行政管理结构中的地位作了探讨和研究。认为,处于核心地区的是中原及其毗邻地区,采取的是直接管辖的郡县方式,管辖方式最为严密;其次是属国管理方式,位于郡县区域的边缘,设置都尉进行管理,内降边疆民族有一定“自治”权;再次是特设机构管理,设置了西域都护、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等机构进行间接管理,并不具体管理边疆民族的内部事务;最外层则是藩国区域,分布在这一区域的边疆民族和西汉王朝保持“藩臣”关系,如匈奴《不同藩属体系的重组与王朝疆域的形成——以西汉时期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 年第 3 期)。

孙建民的《中国传统治理理念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从观念体系上探讨制约边疆经营战略选择的深层动因,力求在战略文化层面对传统边疆战略的深层历史文化渊源作出阐释和解释。胡绍化《一个被史学界忽视的问题:汉朝的初郡政策》(《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6 年第 1 期)、彭建英《东汉比郡属国非郡县化略论》(《民族研究》2000 年第 5 期)分别探讨了初郡和属国的性质问题。

日本学者饭田祥子在《关于东汉边郡统治的一个考察——以放弃和重建为线索》(《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 2006 年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中对于边郡与内郡的分化、东汉对于边郡的放弃与重建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指出,战国秦以来的“耕战”体制,在国内的军事对峙趋于缓和的西汉武帝时期开始崩溃,边郡与内郡,因其地域上的差异,前者以军事活动为主,后者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统治方式逐渐确立。文章得出的结论,如“西汉时期那种以中央政府为媒介的内郡、边郡之间的相互关系,到东汉时期已基本切断”,似有武断之处,而且对于东汉废郡、侨郡、重建边郡的背景缺乏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上述研究对于从整体上把握边疆与边郡的关系,边郡的形成发展与国家治理边疆总体布局的关系方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二、关于边郡的专题性研究

边郡概念研究。边郡是秦汉以来的习称,但关于划分边郡的标准、边郡的范围并没有一个得到大多数学者认同的说法,而探讨边郡本身概念界定的学者也不多见。方国瑜在《云南地方史导论》(《方国瑜文集》第一辑,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中指出,边郡的特点是:(一)郡县区域大都以部族联系范围为基础;(二)既设郡县任命太守、令、长掌治之,又任命土长为王、侯、邑长,实施两重统治;(三)边郡出赋,由土长解纳土贡,无定额赋税;(四)边郡太守主兵,兵由内地遣戍。方国瑜总结出的边郡特点,大体符合西南夷地区边郡的实际,而与北方边郡的情况相距甚远。

木芹在《两汉民族关系史》第十二章《边郡论》中认为,秦汉以来中央政府在边疆民族区域实行了边郡制度,“核心是郡县,这与内郡一致,然而因地理、因民族,尤其是社会经济结构与内郡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边郡打上了时代、边疆、民族等标记”。作者还探讨了边郡与初郡、新郡的区别,“惟称初郡、新郡,仅有初置或新置之意,而称边郡,则有别于内地的郡,即反映了边疆和民族的特点,由此看来,称为边郡是适宜的”。但木芹在划分边郡范围时有将新郡、初郡与边郡的概念等同起来的认识倾向,而将秦汉语境中的边郡,如五原、西河、云中、定襄、上谷、

渔阳等放在边郡范围之外,似乎不大妥当。永田英正在《居延汉简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对边郡概念作了简单化处理,指出边郡是设置在边境地区的郡。谢绍鹄《秦汉边郡概念小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3辑)对边郡的概念进行了认真的梳理,深化了对秦汉边郡概念的认识。但是,作者将西汉、东汉作为两个大的时段加以考察,忽略了边郡范围的动态变化,而且对于划分边郡范围的标准缺乏深入的辨析。

边防政策的研究。毛振发《边防论》(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论述了中国边防的四大特征:其一,中国古代疆域之边有“内边”与“外边”之分;其二,中国古代边防通常以治理“内边”为主;其三,中国古代边防的重点是应付来自北方游牧部族的威胁;其四,中国古代边防具有极大的不平衡、不稳定性。

黄今言《两汉边防战略思想的发展及其主要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认为,两汉的边防战略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在不同历史阶段,由于形势不同,边防战略思想有别,战略思想的文化特征和所产生的效果、影响也有所不同;东汉后期的恩信招抚、以夷制夷的战略在当时有着积极的意义,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节省了国家的开支,但也加剧了夷汉间的矛盾。臧知非在《“偃武修文”与东汉边防》(《人文杂志》2008年第4期)中指出,两汉边防政策的差异,追溯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刘秀确定的偃武修文的治国方针,刘秀以“柔道治天下”、“退功臣而进文吏”,向北没有扩张意识和能力,只能内徙边民。王伟在《东汉治羌政策之检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1期)中提出,东汉治羌政策是在“大一统”和“民族可以变化”的民族思想指导下,实行羌族内徙政策,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戈春源的《试论晁错边疆移民政策》(《铁道师院学报》1986年第3期)、邱剑敏的《刘秀地缘战略思想述论》(《军事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赵梅春的《王符的治边思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2期)、陈晓鸣的《两汉北部边防若干问题之比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3期)、金庆浩的《汉代边疆地区统治理念的传播和意义》(《唐都学刊》2009年第4期)分别探讨了治边理念的问题。

边防法律的研究。两汉的法律制度和律令条文在传世史籍中没有留下完整的资料。清人薛允升著有《汉律辑存》和《汉律决事比》,沈家本有《历代刑法考》和《汉律摭遗》,稍后的程树德《九朝律考》有将近五分之一的篇幅是《汉律考》。但他们都属于钩沉索隐的辑佚工作,不能反映汉律的全貌。张家山《二年律令》是汉律方面最集中的材料,西北汉简中的也有大量材料可以与张家山汉简互相参证,学者检索出了与边疆治理有关的法律条文,对于从法律制度层面认识两汉的边疆治理制度有重要作用。曹旅宁在《张家山汉律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检出数条涉及戍边的律令,其中包括《盗律》、《捕律》、《置吏律》、《口市律》、《户律》。李方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有关汉代边防的法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1期)认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保存了西汉初期的一些法律条文,其中包括边防法律条文。这些西汉边防法律至少包含八个方面的内容,即守边者叛国惩罚、边防出入境、戍边、烽燧、邮亭驿传、边疆紧急事变处置、边吏职责、禁止译诈伪。

边郡人口的研究。葛剑雄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有专章涉及到边郡的移民、迁徙、流动、人口密度等情况,指出“出于政治压力的强制迁移,一旦压力消除,大多不能稳定,对关中和西北的移民都是如此”。孟广耀、何天明《西汉时期内蒙古民族人口考论》

考察了西汉时期内蒙古地区的人口,对居住于该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进行了估算,认为“将近 70% 的人口集中在西部,即鄂尔多斯和阴山南”(《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 年第 1 期)。涉及到秦汉边郡人口问题的论著还有,汪桂海的《从汉简看汉人逃亡匈奴之现象》(《史学月刊》1993 年第 6 期)、王子今的《略论秦汉时期朝鲜“亡人”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8 年 1 期)、石方的《中国人口迁移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袁祖亮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民族人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李吉和的《先秦至隋唐时期西北少数民族迁徙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 年版)。

军事防御系统的研究。关于防御系统的研究,内容和范围逐步扩大,对具体问题的讨论日趋细化、深化。初师宾在《汉边塞守御器备考略》(《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根据居延出土简牍,参照先秦与汉以来关于守御制度的文献记载,按照其功用,将汉代居延的守御器备设施分为十二类,并对每一类进行了详细的考订。守御制度与器备的探讨,有助于复原当日边塞的屯戍面貌和战争实况。吴初骧根据居延破城子和敦煌马圈湾汉简、烽燧遗址的调查,对汉代烽火制度作了新的探索(《汉代烽火制度探索》,载《汉简研究文集》)。薛英群在《居延汉简中的“秋射”与“署”》(《史林》1988 年第 1 期)中通过对居延汉简的研究,探讨了汉代军事防御系统中的“秋射”与“署”的性质与作用。徐乐尧在《居延汉简所见的边亭》(载《汉简研究文集》)中将边郡的亭分为燧亭、邮亭、农亭以及都亭与乡亭、市亭等,分属军政与民事系统。而吴荣曾《汉代的亭与邮》(《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2 年第 4 期)认为“毫无疑问汉代边郡的亭属于军事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王子今《秦汉长城与北边交通》(《历史研究》1988 年 6 期)和《试说秦烽燧——以直道军事通信系统为中心》(《文博》2004 年第 2 期)、张俊民的《从汉简谈汉代西北边郡运输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 年第 3 期)分别对边郡的交通和军事通信系统进行了探讨。高荣的《汉代西北边塞的邮驿建置》(《简牍学研究》第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考察了西北边塞的邮驿系统。张经久、张俊民在《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骑置”简》(《敦煌学辑刊》2008 年第 3 期)中考察了骑置的功能和作用。

关于边郡防御的日常运作,张俊民在《汉代边境防御制度初探——以出土汉简日迹简为中心的考察》(《简帛研究二〇〇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中认为,为数众多的日迹简表明,日迹是构成汉代边境防御体系的重要制度之一,在西北边塞地区得到了切实有效的贯彻执行,对汉代边防意义重大。朱慈恩《汉代边防职官循行之制考论》(《内蒙古社会科学》2007 年第 5 期)认为,汉代边郡的候望系统在边塞防御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边防职官的循行纠举都是围绕着屯戍候望展开的。汪桂海《简牍所见汉代边塞徼巡制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 年第 3 期)认为,汉代边塞建立起了严格的徼巡制度,对内可以协助控制社会治安,对外可以防止匈奴等族敌对力量的侵扰、掳掠,为维护封建政权的稳固发挥着重要作用。特日格勒的《汉代边郡候望体系》(《秦汉史论丛》第十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提出,预警系统是汉代长城防御体系之前沿,候望是预警的重要手段,所以汉长城的预警系统也成为候望系统。马明达的《汉代居延边塞的医药制度》(《甘肃师大学报》1980 年第 4 期)、王宗维的《汉代令居塞的地理位置》(《兰州学刊》1985 年第 1 期)、李并成的《汉敦煌郡的乡、里、南境塞墙和烽燧系统考》(《敦煌研究》1993 年第 2 期)、宋会群、李振宏的《汉代居延甲渠候官

部燧考》(《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刘光华的《西汉西北边塞》(《简牍学研究》第四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王文楚的《西汉西河、上郡、北地三郡边塞考》(《文史》第21辑),杨惠福的《汉代酒泉郡北部塞防考述》(《简牍学研究》第四辑)、赵沛的《居延汉简所见西汉时期西北塞日常勤务制度》(《西北史地》1991年第2期),陈晓鸣的《汉代边兵的日常生活和待遇问题述略》(《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黄今言、陈晓鸣的《汉朝边防军的规模及养兵费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陈菁的《两汉时期河西地区烽燧亭障规划营建刍议》(《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也分别从不同方面对边塞的设置、管理及防御系统进行了研究。

关于边塞和防御系统,台湾地区学者的研究也有重要进展。劳榦在《汉代的塞和后方的重点》(《史语所集刊》第60本第3分,1989年)中指出,塞就是一套组织,除去前方的工事以外,还包括塞上各点的交通,以及前方对后方的联络通讯方式。西汉一代的西方和北方,确有几个后勤重点,在畿辅的云阳和雍,在西方的上邽,以及在东方的黎阳,都是屯兵、屯粮的中心,也可能还是烽燧交通的中心,这些重点的设施,到东汉时期还有影响存在。吴昌廉探讨了边塞部的组织《汉代边塞“部”之组织》,《简牍学报》1985年第11期)。

边郡职官系统的研究。关于边郡职官系统,李大龙做了综合性的研究。他的《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分西汉王朝的边政、王莽的边政改革及评价、东汉王朝的边政、两汉王朝边吏的选拔和任用制度、两汉王朝边吏的作用几个部分对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作了全面研究。日本学者藤枝晃对边郡的政府组织作了综合性的探讨,将边郡组织划分为郡太守、都尉府、哨所组织、兵站设施、交通管理设施、属国都尉、农都尉几个不同的部分,对于我们认识边郡各类组织的职能及相互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汉简职官表》,孙言诚译,《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关于汉代边郡太守以下治兵与治民两大系统的职权关系,徐乐尧根据居延、敦煌汉简资料,认为“汉代河西边郡,在建武六年以前,早至居摄元年、三年、王莽始建国四年,甚至更早至宣帝时期,治兵与治民两大系统的职权关系,已不同于两汉的旧制,而有一定的调整”(《汉简所见边郡军事与民政系统的职权关系》,《简帛研究》第一辑,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关于边郡太守的在任期限,张俊民对敦煌悬泉置汉简中所能见到的与敦煌太守相关的人名简文近160条进行了整理,建立了敦煌太守人名编年(《敦煌汉简所见人名综述(三)——以敦煌郡太守人名为中心的考察》,《简帛研究二〇〇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对于边郡守尉与内郡守尉职守的区别,宋超在《汉匈战争与北边郡守尉》(《南都学坛》2005年第3期)中指出,郡之设置源于边地,最初着眼于军事功能,北边诸郡守尉,除与内郡相同的职责外,还肩负着防范匈奴侵扰的重任。关于边郡的都尉、部都尉、农都尉的设置、职能及关系,学者的看法各异。劳榦《居延汉简考证》认为“边郡属国都尉外,皆农都尉”(《史语所集刊》第30本上,1959年)。陈直提出“边郡都尉,大部分可以兼称为农都尉”(《汉书新证》“百官公卿表”农都尉条)。陈梦家主张“边郡每郡各一农都尉”,唯张掖郡则有两个农都尉,即“居延农都尉和张掖农都尉”(《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载《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杨剑虹认为“居延地区既有部都尉又有农都尉,属国下又设农都尉”(《从居延汉简看西汉在西北的屯田》,《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徐乐尧主张,领有“将屯”加衔的居延部都尉可领导屯田

事宜,无再增设居延农都尉之必要,并推断在都尉以下,自候官一级起另立田官系统,管理屯田事宜(《居延汉简所见的边亭》,载《汉简研究文集》)。刘光华则推断“将屯者或为将军,或为太守,或为都尉,与屯田之田官系统中的农都尉无关”(《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德国学者纪安诺提出“每个郡置一农都尉的说法似更难成立,有的边郡设都尉,有的不设,内郡的都尉和边郡的都尉有性质上的差别”(《汉代张掖都尉考》,《简牍学研究》第三辑),李炳泉的《两汉农都尉的设置数额及其隶属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2期)认为,农都尉的始置时间为武帝元狩四年后不久,以后大致每一边郡一农都尉的格局,农都尉在行政上由最高当局和太守双重领导,在屯田事务上由大司农掌管。

此外,赵红梅《玄菟太守考》(《辽宁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李并成《汉敦煌郡宜禾、中部都尉有关问题考》(《西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2期)、孙言诚《秦汉的属邦和属国》(《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贾敬颜《汉属国与属国都尉考》(《史学集刊》1982年第4期)、张国庆《东汉“辽东属国”考略》(《历史教学》1990年第2期)、李并成《汉张掖属国考》(《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边郡的职官进行了研究。

廖伯源《汉初郡长吏考》(《国学学刊》2009年第1期)注意到了千人官的职能在两汉之际的重要转变。认为左骑千人官及千人官,先为左骑千人与千人之城障,其后百姓附居其地,人口渐多,朝廷乃于其地置县,仍用左骑千人官及千人官之名为新置县之县名。

关于候官的职能,永田英正认为“最近基本的功能是在都尉府和前线的候燧之间起着桥梁渠道的作用,候官虽然作为一个军事基地存在着,但它又不仅仅只是一个单纯的军队的驻地,兵站基地这个侧面更显得重要”(《居延汉简研究》)。

对于边郡基层职官的研究也有了重要进展。于振波在《居延汉简中的燧长和候长》(《史学集刊》2000年第2期)中指出,居延汉简中所反映出的汉代西北边塞防御系统中的基层官吏燧长和候长,其爵位均未超过民爵范围,基本属于役吏,具有亦民亦吏的性质。高荣、张荣芳《汉简所见的“候史”》(《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对候史在边防组织体系中的地位、作用进行了探讨,指出“作为汉代边塞防御组织的基层官吏,候史与候长之间不是一般的主管与属吏的关系。候史往往是以候长副贰的身份处理部内事务”。此外,蒋中锋的《两汉时期西北地区边吏的吏治浅探》(《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李桂芳的《两汉时期西南地区的吏治与用人策略》(《成都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分别探讨了两汉的边吏问题。

边郡地理与边郡设置沿革研究。后晓荣的《秦代政区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周振鹤的《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李晓杰的《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形成了研究秦汉历史地理的完整体系,其中都有笔墨涉及到边郡的行政区划及设置沿革等方面内容。辛德勇的《秦汉政区边界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是研究边界地理的综合性著作。他指出,秦末在西北防线上的兵力虽然有所回撤,却始终没有放弃据守阴山长城防线,汉初继承的正是这一边界,而这一边界是沿用战国赵武灵王所修筑的长城防线。

王仁康《再谈汉代金城郡治的地理位置——与刘满同志商榷》(《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张大可等的《关于西汉金城郡治允吾位置的地理的初步考察》(《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张博泉的《汉玄菟郡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0年第11期)、李殿福的

《西汉辽西郡水道、郡县治所初探——兼论奈曼沙巴营子古城为西汉文成县》、方国瑜的《汉牂柯郡地理考释》(《夜郎考》,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刘光华的《敦煌建郡于汉武帝后元元年辩》(《秦汉史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徐家国的《汉玄菟二迁址考略》(《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3期)、谷苞的《论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的历史意义》(《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李逸友的《和林格尔壁画所反映的东汉定襄郡武城县城的地望》(《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1期)、胡克敏的《西汉夜郎国都邑在望谟的桑郎》(《贵州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王星与崔永红的《略论“莽设西海郡”及其与金城郡之关系》(《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王子今的《西河郡建置与汉代山陕交通》(《晋阳学刊》1990年第6期)、史念海的《论九原郡始置的年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辑)、赵以武《关于汉魏晋时期北地郡的变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3期)、朱郑勇《西汉初期北部诸郡边界略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辑)、曹旭东的《东汉初年的西北边郡省并与徙吏民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2辑)、李勃的《汉元帝罢珠崖郡后海南岛之归属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1期)和《西汉合浦郡之朱卢县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3辑)、冯建勇的《秦汉时期云南西部疆域的确立》(《大理学院学报》2007年第9期)、蔡万进的《秦“所取荆新地”与苍梧郡设置》(《郑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王庆宪的《西汉武帝复增属国地理位置考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2期)分别对边郡和属国的设置时间、地望、边界、徙民问题进行了研究。

边郡屯戍。边郡的屯田组织与各级农官的设置,是一个较为复杂而至今仍未获圆满解决的问题。薛英群在《汉代西北屯田组织试探》(《西北史地》1989年第1期)中指出,汉代西北屯田的组织机构为三个并列的系统:以军屯生产管理系统为主,与生产保卫系统和大司农直属“辟”田系统相辅成。前两个系统与地方行政管理系统的郡县乡里和候望系统的府官部燧相同,均为四级制。后一个系统则是垂直领导,独立建制,有别于前者。刘光华在《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中指出,汉代大规模的西北边郡屯田,始于汉武时,民屯产生于献帝建安初,汉代屯田的管理系统并非一个,但主要的是农都尉、农令、部农长、农亭长这个系统。李振宏的《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版)对戍吏劳绩制度、戍吏除迁黜陟制度、戍卒管理制度、戍卒的经济生活、医疗卫生状况、精神文化生活、屯戍生活中的古典人道精神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此外,武守志的《汉代河西屯田简论》(《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陈汉平的《赵充国的屯田及其收效》(《学习与思考》1981年第4期)、丁光勋的《对赵充国屯田业绩评价不宜过高:与陈直先生商榷》(《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瞿宛华《试论赵充国在河湟的屯田》(《西北史地》1987年第4期)、徐克尧与余贤杰的《西汉敦煌军屯的几个问题》(《西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4期)、臧嵘的《两汉屯田实边的历史考察》(《光明日报》1983年5月11日)、杨万荣的《两汉屯田制性质初探》(《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张芳的《居延汉简所见屯田水利》(《中国农史》1988年第3期)、柳春藩的《西汉徙民实边说质疑》(《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杨际平的《西汉屯田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宋治民的《居延汉简所见西汉屯田二三事》(《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李古寅的《汉代西北民屯结构辨析》(《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臧知非的《西汉屯戍制度的几个问题》(《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刘汉东的《汉代西北屯田及其

土地形态演化探论》(《郑州大学学报》1989 年第 5 期)、杨寿川的《西汉屯田制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云南大学学报》1989 年第 3 期)、李清凌的《两汉在西北的屯田制度》(《简牍学研究》第二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倪根金的《汉简所见西北垦区林业》(《中国农业》1993 年第 4 期)、张军与罗惠《也论赵充国河湟屯田的成效:兼论屯田奏的理论意义》(《西北史地》1998 年第 3 期)、王万盈的《两汉守边戍卒管理初探》(载《简牍学研究》第三辑)、朱奎泽的《汉代西北屯戍系统粮食分配问题探析——以汉简资料为中心》(《中国农史》2007 年第 2 期)、邵正坤的《汉代边郡粮食廩给问题探讨》(《南都学坛》2005 年第 3 期)、杨芳的《汉简所见河西边塞军屯人口来源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 年第 1 期)、李大龙的《“屯田”并非赵充国治羌政策的核心内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 年第 4 期)以及日本学者尾形勇的《汉代屯田制的几个问题:以武帝、昭帝时期为中心》(《简帛研究译丛》第一辑)、吉村昌之的《汉代边郡的田官组织——以见于简牍的“闲田”为线索》(《简帛研究译丛》第二辑,湖南出版社 1996 年)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边郡屯田的问题。此外,余华青的《秦汉边郡牧师苑的兴衰及其影响》(《人文杂志》1984 年第 1 期)、雍际春的《西汉牧苑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 年第 2 辑)、方诗铭的《汉代的“蜀郡工官”和“广汉郡工官”》(《历史知识》1980 年第 5 期)探讨了边郡牧师苑、工官等边郡特种官问题。

关于道的研究。罗开玉的研究,将视角放在县制与道制基层组织的区别方面,对我们认识不同区域的边郡组织形式有重要的启发作用。他认为一般典制都有一个由创行到普及的演进过程,道制也不例外。道与县,绝不仅是名称不同。道辖地的民族基本特征是保留着氏族、部落、部落联盟这些以血缘关系、婚姻关系为纽带的原始组织。在道辖地一般不再设乡、里基层行政组织,而假手民族酋长行使管理权。郡县制度与郡道制度有较大差别。道与内地的县在行政建制上不同。郡县制下设乡、里和亭、邮;郡道或属国都尉道,下边是民族原有组织系统和亭、邮(《论秦汉道制》,《民族研究》1987 年第 5 期)。对于道的设置时间,骈宇騫《秦“道”考》(《文史》第 9 辑,中华书局,1980 年版)认为秦设道最迟不晚于秦始皇二十年。

对于道的职官,周伟洲在《新发现的秦封泥与秦代郡县制》(《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中指出,从现存的封泥看,“道长”之印大大超过“道令”之印。西汉的“道令”、“道长”之下,与县一样置丞、尉佐官(长吏)。现存封泥有“夷道丞印”、“严道丞印”、“灵关道丞”及“犍道右尉”、“刚甝右尉”、“严道左尉”。

文书与边郡行政运作。卜宪群在《秦汉官僚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中分别探讨了中央政府的公文运转、州郡公文运转与行政管理,对认识文书与边郡的行政运作有重要的启发。汪桂海在《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版)中依据大量的简牍文书和传世文献、碑刻、封泥等,深入研究了官文书的类别、制作、运行与管理,对了解边郡的文书制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薛英群的《汉代官文书考略》(载《汉简研究文集》)、何双全的《居延甲渠候官简牍文书分类与文档制度》(载《简牍学研究》第一辑)、韩国学者金庆浩的《汉代文书行政和传递体系——以“元康五年诏书册”》(《简帛研究二〇〇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对于认识边郡的文书与行政运作的关系也有启发作用。



### 三、关于边郡的区域性研究

方国瑜有关部族区域与统治区域的见解是开拓性的,深化了我们对不同地域边郡的制度性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背景的认识。他在《汉晋时期西南地区的部族郡县及经济文化》(《方国瑜文集》第一辑)中认为,在西南夷地区,郡县统治机构是在部族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系统就是部族组织的系统。郡设太守,同时也封部族大长为王,所统治的区域是相同的,这是所谓“酋长世其土,流官治其民”的土流两重政策。孙家洲的《论汉代的“区域”概念》(《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彭清深的《秦汉西北汉族族群之历史观照》(《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分别对汉代区域概念和西北的汉族族群进行了研究。周长山针对中央政府对边郡的控制力及边郡对中央政府的依存度正反两个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他在《汉代地方政治史论》的第五章《对汉代郡县制的地域性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指出西北地区在两汉交替之际,县级政区高达三分之一以上的废止率,即清楚地表明了其对中央政权的高度依存性;朝廷对西南夷地区的控制常有鞭长莫及之感。

高荣对西南的郡县属国的双轨制进行了探讨(《汉代对西南边疆的经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3期)。蓝勇对于汉代对西南边疆采取的教化政策从政区的名称入手加以探讨,认为广汉、广柔、宣汉、汉昌、南安、南广、平夷等县名有教化色彩,作者还从西南边疆政区名称教化功能演变入手,研究了中原强势文明向西南的拓展过程(《西南边疆政区名称教化功能演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

黎小龙对于汉代治理西南边郡的政策及其背景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西南边疆开发在全国边疆开发和国家安全保障的大局中,在战略上只能处于从属性、辅助性地位(《战国秦汉西南边疆思想的区域性特征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

尹在硕关于乐浪户口集簿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朝鲜的郡县制很有价值。他在《韩半岛出土简牍与韩国庆州、扶余木简释文补正》(《简帛研究二〇〇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指出,乐浪郡户口集簿的行文格式、内容与中国内地汉墓发掘的户口簿相一致。

陈育宁的《论秦汉时期鄂尔多斯地区的经济开发》(《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何天明的《两汉时期呼和浩特地区的建置与民族构成》(《体育教学与科研》1985年第4期)、王昱的《青海东部地区早期郡县设立时间考辨》(《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臧知非的《秦汉时期河套地区的开发及其意义》(《西北史地》1987年第3期)、翟宛华的《试述西汉对河西的开发》(《兰州学刊》1985年第6期)分别探讨了区域边郡的问题。

### 四、关于今后秦汉边郡研究的思考

对史料的发掘、整理、运用是本世纪边郡研究的重要成绩,历代典章制度关于边郡的记载较为零散,王国维、劳榦、陈梦家、陈直等前辈学者对边郡政府组织、行政运行、政府职能、边郡的军事防御组织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针对边郡制度的微观研究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至今秦汉边郡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与秦汉史其他领域

相比,研究仍显薄弱,与边郡在秦汉国家结构中的地位不相称,笔者以为今后的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方面:

第一,秦汉边郡研究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状态,首先是时间上的不均衡,明显地重两汉而轻秦;其次是地域上的不均衡,表现出明显的重西北轻其他地域的倾向;再次是专题上的不均衡,尤以边郡屯戍方面的论著最多,据不完全统计,有关屯戍的论著 28 篇(部),这还不包括关于西域屯戍的论著在内,此外,军事防御 27 篇(部)、历史地理 25 篇(部)、边郡职官 21 篇(部),而对于其他专题如文书与边郡的行政运作、边防政策、边郡守尉政治实践对边郡形势的影响方面关注度明显不够。

第二,长期以来,大多学者将边郡作为一个习称使用,而对于边郡概念的含义、边郡概念的形成过程、边郡与内郡的分野、不同时期边郡的范围等尚缺乏深入的辨析。由于边郡的概念和范围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就无法以秦汉边郡为整体研究对象,对边郡的区域化差异以及边郡职官设置、迁转、任职时间与内郡的差异做系统性的研究。

第三,在探讨边郡的制度时,就制度谈制度的文章较多,对边郡特殊的社会文化、民族关系对制度客体的影响,制度变化与边防政策和政局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缺乏深入的探讨;边郡的范围表现出一种动态的结构,体现出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往对边郡的设置、废弃、侨置与重建大多停留在历史地理层面的研究,着重探讨边郡的边界的变化、郡县的省并,而对于从政治史的角度研究边郡范围变化与政局关系方面还不够深入。

## 东晋南朝墓志研究综述与理论思考

朱智武

(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1171)

作为出土文物资料,中国古代墓志既是彼时历史的实物见证,又是传世文献资料的补充,历来受到相关领域文史研究者的重视。就其整理与研究来说,前人多注目于出土数量甚多的北朝墓志及隋唐以降的历代墓志,而东晋南朝墓志由于历代出土较少,学界对其研究不多。然而,随着近年来国内考古发掘工作的新进展,东晋南朝墓志屡有发现,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日趋深入。现将既往研究成果作概要总结,冀对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开展有所裨益。

### 一、学术史的总体回顾

东晋南朝墓志为晚清以前传统金石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然而真正意义上科学研究则是伴随现代考古学、历史学的发展而出现的。其学术发展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